

道德的沦陷

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他们严重地缺乏信

仰精神。缺乏仁爱精

他们错误地把回

蔡崇正



问天命

六回归人类本

问天命 (第二部)

道德的沦陷

黎 鸣 /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的沦陷/黎鸣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 9

(问天命)

ISBN 7-5087-0227-1

I. 道... II. 黎... III. ①思想史—世界—近代
②思想史—世界—现代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0631 号

丛 书 名: 问天命

书 名: 道德的沦陷

著 者: 黎 鸣

责任编辑: 张 承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购部: 6606027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印张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227-1/B·70

定 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者
的
话

《问天命》系列

编 者 的 话

传播知识，开启智慧，向来是知识分子天定的使命。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大，神经越来越紧张，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精神萎缩，道德滑坡。这些现象给现代化的进程涂抹上了不和谐的音符。

黎鸣先生作为一代智者，耗费了近十年的心血，从中西方先进文化的观念出发，以自己的视角，对道德和人性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和思考，对困惑人类和世界的大问题进行了独特的阐述，立论宏伟，人文情怀跃然纸上。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原则，我们愿将此书系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亦品亦评，相互促进。

2004年仲秋



目 录

上篇 功利理性主义与文化沙漠

第一章 社会情感的消亡·····	(21)
第二章 家庭情感的消亡·····	(30)
第三章 道德精神的沦丧·····	(64)
一、吸毒——肉体敏感点的诱惑·····	(75)
二、淫乱——性快感的沉缅·····	(79)
三、暴力与犯罪——强烈感官刺激的结局·····	(85)
四、对获取暴利的迷狂 ——全人类的赌博心态·····	(98)
五、心灵木乃伊·····	(122)
信仰的迷乱与邪教迷信·····	(130)
理性的迷乱与艺术的衰亡·····	(143)
爱人与家园的消亡·····	(163)
六、21世纪，人类进入道德真空的时代·····	(203)
七、现代文化传媒如何彻底变 成了反文化的工具·····	(222)

中篇 物质消费主义与生态破坏

第四章 物种的灭绝与人种的退化·····	(259)
第五章 人口爆炸与资源的枯竭·····	(269)
一、矿物资源和能源的共同极限·····	(275)



二、生物资源的枯竭·····	(276)
三、啊，土壤、空气、水、阳光·····	(282)
土壤荒漠化·····	(283)
水、水、水·····	(291)
可怕的空气和阳光·····	(304)
第六章 21 世纪，人类面临社会生态	
——自然生态双重总危机·····	(320)

下篇 21 世纪人类向何处去

第七章 西方理性主义，前面是悬崖·····	(327)
第八章 复活人类的原精神·····	(330)
第九章 人类的新生之路	
——人类生命意义的革命·····	(340)
“哲学乌鸦”黎鸣（代跋）·····	苍狼 (356)



上篇

功利理性主义与文化沙漠

旅居西方的一位华裔学者孙志文先生在其所著《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的自序中说，他多年来“一直为某些矛盾的现象所困惑，现代人卷入越来越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我们只消举许多控制人日常生活的科技为例），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性；现代人愈是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教育系统里引进愈多的科技，真正的学习过程愈加罕见；学生愈加以投入所谓客观的学习法，学生踏出校门时素质愈差；现代医院用科学仪器愈多，医生离他的病人愈远”。^①

孙志文先生对当今“现代化”西方文化的困惑和质疑，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曾被另一位学人辜鸿铭先生表达过，鉴于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酷烈、凶残，及其给西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辜鸿铭先生似乎更超越了困惑和质疑，而对西方文明抱有某种道德上居高临下的哀怜。一种为中华民族文化道德的优越感所鼓舞的自负之心促使他尖锐地批判西方文明，并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路为西方人未来的出路。辜鸿铭先生谴责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谴责法兰西的“自由大宪章”，“这种今日欧美的群氓崇拜教，除非它立即被打倒，否则就不仅会毁掉欧美文明，还要毁掉全人类

^① 《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三联书店，1994，第7页。



的文明”^①。辜鸿铭先生向全世界推崇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和“良民宗教”。辜鸿铭先生对本国文化的全面呵护（如赞美女人的小脚、男人纳妾以及皇帝的极权专制等等）几近于迂腐，但他用中国人的文明之眼所察觉的西方文明的裂痕及其凶险的终曲，却不能不说具几分睿智，甚至相当的准确。

在本书第三部由笔者提出了第三大人学问题：

为什么人类社会愈是按照西方文化模式走向“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却愈是表现出冷酷无情，甚至残忍凶狠，这样的“进步”究竟要把全人类推向何处？

我们可以看到，笔者的问题有对孙志文和辜鸿铭两位先生的问题进行综合之意。在求解这第三大人学问题的倡导中（见本书第三部），笔者与辜鸿铭先生也具有表面上看来的一致性，如认为中国文明之路是西方文明未来之路，但笔者绝不愿意像辜鸿铭先生那样迂腐地呵护中国的一切，而是相反，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中丑陋的东西实际上比西方文化还多，所以，虽然西方人具有必须向中国人学习的一面，但中国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的东西实际上更多，二者大体在量上的比例为二比一。中国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文化传统中的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西方人必须向中国人学习仁爱精神。

笔者一贯的观点在本书的前面已多次提出，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文明实际上是由两种人类的原精神（古希伯来人首创的信仰精神与古希腊人首创的求知精神）共同支撑的。但这两种人类原精神在西方历代人们的心中并不是和平共处的，而是竞争不止，各不相让。在我看来，西方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共分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为希腊—罗马史；第二大阶段为中世纪宗教—世俗权力史；第三大阶段为西方近现代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史。

第一大阶段以古希腊人的求知精神为主，以古希伯来人的一种论宗教为次，直至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会兴起；第二大阶段以古希伯来人的唯一神宗教信仰精神为主，古希腊人的哲学求知精神为次，直至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第三大阶段的历史趋势是向第

^① 《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第165页。



一大阶段的部分复归，古希腊人的哲学求知精神重新登上了主要历史地位的宝座，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精神则不仅趋于衰落甚至可能趋于消亡。宗教信仰精神的衰落乃至消亡也即人类原精神中的信仰精神的衰落和消亡，除非信仰精神找到新的时代的新的形式，这将意味着人类中的一种原精神的死亡，这其实也就是人类人性的部分死亡。这不仅将给西方人而且将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厄运。愈来愈丧失了信仰精神的西方人类进而全人类，其“现代化”的步伐愈是加速，他们离开美好幸福的人生的距离不是愈近，而是愈远。这正是回答第三大人学问题的关键之一。另一个关键则是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之中本身便缺乏人类的第三个原精神仁爱精神，基督教的爱人精神只能说是仁爱精神的代用品，或者说是伪仁爱精神，正如说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经学是宗教信仰精神的代用品是伪宗教精神、宋代理学是求知原精神的代用品是伪求知精神一样。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其实是由惟一的一种人类原精神——孔孟原儒家的仁爱精神和两种伪原精神——汉代经学的伪宗教精神和宋明理学的伪知识精神共同支撑的。比较之下，西方人的历史是由两种人类的原精神——古希伯来人的信仰精神和古希腊人的求知精神再加上基督教的伪仁爱精神共同支撑的。在原精神上西方人比中国人多一倍，所以中国人的历史的进化速度比西方人缓慢了一倍。很明显中国人的中世纪（两千多年）就比西方人的中世纪（一千多年）在时间上整整长了一倍。

在关于西方历史的认识方面有两位西方思想家给予了笔者以重要的启示。一位是德国的哲学思想家雅斯贝斯，他的关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为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的观点促使笔者对人类原精神的发现有所顿悟。雅斯贝斯对于在轴心时代同时在东方和西方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人类思想家一事表现出了只有哲人才会有的惊叹和敏感。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保罗等人还是东方的孔子、老子、佛陀等人，他们同都对于各该地区的文化、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长期不可泯灭的巨大影响。笔者把这种不可泯灭地、长期地影响历代人类的东西即称作人类的原精

在关于西方历史的认识方面有两位西方思想家给予了笔者以重要的启示。一位是德国的哲学思想家雅斯贝斯。



给笔者以启示的另一位西方思想家是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

神。进一步分析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的各种文化、文明历史发展的差异，更促使我把它们归类为三种人类的原精神，它们即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惟一神宗教的信仰原精神，古希腊哲人首创的自然哲学的求知原精神，古中国圣人首创的儒家孝悌忠恕的仁爱原精神。

给笔者以启示的另一位西方思想家是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的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享誉学界。在书中，他运用希腊—罗马的历史模型重新展示了全部人类的历史。他以文明为历史的单位，尤其以希腊—罗马的历史文明为典型的历史单位。他视文明为完整的有机体，具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全过程。他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这种思想得自歌德的《浮士德》。在那里，上帝接受了魔鬼靡菲斯特的挑战。他认为文明的成长表现于文明主体社会的“自决能力”，这种自决能力与后来耗散结构理论的创造者普里高津的“自组织性”颇为相近；这里须指出，汤因比没有像不少人那样把技术能力直接看作是文明长的决定因素，这的确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深邃性不同一般。文明衰落的原因也即“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的解体则预示着新文明的诞生。汤因比视文明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三种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而社会文明的形式则为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教会和外部蛮族的入侵相继发生。这一切概念显然都与希腊—罗马的历史密切相关。汤因比本人即为研究希腊—罗马历史的专家，在这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汤因比不仅用大一统帝国——大一统教会——民族大迁移（伴随文明中的转移）的顺序而进的历史模型来解释西方古代史、西方近现代史，而且用它来解释地球上其他一切地区的文明史。他把自古以来的人类史共分解为21种，后来又扩充为26种，到了《历史研究》最后一卷（第十二卷）时更扩大为37种。

与一般的史学家的国别史、断代史相比，汤因比的历史思想的确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很有意义的文明历史模型，这就是希腊—罗马模型。虽然用这种历史模型去研究全人类的历史，他的



成功的程度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了晚年他自己也清楚地看到，全人类的历史，除了应有希腊—罗马模型之外至少还应该希伯来模型和中国模型。这三种模型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基元性的差别，这一来就使他的思想同前面曾谈到的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的思想有了相交之处。正是这两位思想家的这些思想的启发，促使我顿悟到，人类的文化历史很可能具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原精神，它们主要的精神力量分别支撑着三种不同性质的文明的诞生和成长，这种文明诞生和成长的命运便命定地降落在希伯来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身上，使之肩负着不同的人类原精神的精华并昭示于全人类的历史文明，而其他的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对于这三种人类原精神或三种基本的文明原型则或多或少程度不等地单独具有或兼而有之。对于某些更原始的民族来说，则可能根本不曾具有或具有的程度极低。

人类的原精神性的存在与人类作为动物生物体的存在不同，后者的存在源自大自然的绝对的必然性，前者的存在却出自人类自身绝对的创造的自由。人类的原精神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自我创造的存在。用普里高津的术语，这是一种人类高度自组织性的升华的存在。精神性不是人类生而有之的东西，甚至有的人从生到死也不曾拥有过，这是真正的原始野蛮人，或者就是现代人类中的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精神性是可以遗传的，它通过文化习俗遗传给后代。正是因此，不同的文化习俗可能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具有完备的精神性（包括全部三种原精神）的人是极少的。人类文化的真正的进化即在于使愈来愈多的人具有丰富的全部人类的原精神。理想中的完人既是一个具有崇高信仰的人，又是一个具有旺盛的求知渴望的人，更是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非常遗憾，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都只能造就人们永远偏向地仅具有一项原精神或至多两项原精神，这种文化虽然可以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随着这种文化的进步而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却在更多的

全人类的历史，除了应有希腊—罗马模型之外至少还应该希伯来模型和中国模型。这三种模型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基元性的差别。



彻底的希腊模型（理性主义）最终将造成人类精神全都变得疯狂的世界。这不是危言耸听，完全丧失了信仰精神和爱人精神的人类的确只能有这种悲惨的下场。

时候多于它给人类带来的欢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在一种不健康的文化习俗中痛苦地呻吟，而很少是生活的欢快。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人类所拥有的精神性普遍地不完备，从而不健全。

诚如汤因比所指出的：“我们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这个比喻不是十分完美的）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①汤因比凭着他的历史学家的直觉，没有说西方社会是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儿女，却说西方社会是古希腊社会的儿女，这值得我们外行人深思。我的理解是，西方社会中的人们所普遍具有的人类原精神与古希腊社会中的人们所普遍具备的人类原精神类似，即古希腊哲人首创的自然哲学的求知精神、理性精神，而与西方中世纪社会中人们普遍具备的古希伯来人首创的唯一神论宗教的信仰精神全然不同，或相距较远。

用汤因比的历史模型的语言来说，即是当代西方社会正在愈来愈使自己成为单一的古希腊模型。这种模型的长处是有目共睹的，它不断地求智探秘，向上直逼苍天宇宙，向下直探物质夸克，向中则直捣人类自身，它把人不仅大卸八块，更不断分解成基因、密码，直至彻底的物质元素。这是一种迄今为止力量的锋芒无与伦比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现在看来，它对于人类的害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无论对于自然、社会或人类自身，都是以造成无穷无尽的分裂而告终。本书在前面已经论述了人类社会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意识与潜意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分裂，最后是每个人自身的精神的分裂。彻底的希腊模型（理性主义）最终将造成人类精神全都变得疯狂的世界。这不是危言耸听，完全丧失了信仰精神和爱人精神的人类的确只能有这种悲惨的下场。

具体看历史上的古希腊也可以看到，那基本上是一个永远分裂的世界，仅仅巴尔干半岛那样一块不大的土地上就城邦国家林立，从来就不曾存在任何可能统一的希望。不能统一，就是分裂，而且是永远的分裂，无穷无尽的战争。亚历山大的大征服更是把分裂的

^① 《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4页。



模型扩大到了中东、印度、地中海沿岸，并从而产生了罗马的世界。罗马帝国的统一是超强（暴力）权力的统一，后来不得不吸取古希伯来文化的模型，也即富含人类信仰原精神的文化模型，并从而开始了西方中世纪的另一种文明。

西方近代历史的开始则依然是战争和扩张，这一点与古希腊模型完全相同。大英帝国的超强（暴力）权力的统一走了罗马帝国的老路，紧紧继承了大英帝国权力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但现在已经没有第二次的希伯来模型可以挽救西方了，西方人的信仰精神已经全面崩溃，所向无敌的理性主义像一片焦土之上的骄阳，毒热的理性主义的阳光像烈火一样烧毁了一切生命赖以存活的东西，它只布下分裂，分裂，永远的分裂。西方自由的个人主义正在使任何一个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都变成无情无义的人原子，甚至肉体的夸克。

汤因比对于已经完全希腊模型化的西方社会愈来愈感到悲观，在这种强权统一和实际分裂的希腊模型中，汤因比完全看不到人类可能走向和平统一的希望。他把他的希望的目光转向了东方的中国。

汤因比说，“我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多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体现着这种美德。”

“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立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 21 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西方自由的个人主义正在使任何一个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都变成无情无义的人原子，甚至肉体的夸克。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觉。

“第六，这种直觉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备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

“第八，……

“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上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央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①

汤因比寄世界统一的希望于中国文明的模型。汤因比的历史直觉是可贵的，但他没有指出，中国模型的真正的重心应是中国人传统中所具有的仁爱的原精神，而不是既存的中国政治。

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与汤因比进行对话的日本人池田大作便立即作出分辨，能够统一世界人类的决不是“禁锢个人的创造性 and 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倾向”^②。作出这种分辨是非常必

^① 《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287—289页。

^② 同上，第289页。



上篇

功利理性主义与文化沙漠

要的。中国文化传统决不像辜鸿铭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几近于完美。中国传统的政治扼杀人类灵性，中国传统的经济缺乏增长活力，这便是显然的不足。惟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仁爱原精神确实值得全人类继承和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中国老百姓特别重视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和亲情、友情等人间感情。简言之，传统的中国人具有深厚的人情味。中国人没有狂热的宗教情绪、种族情绪、阶级情绪，中国的汉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混杂的同文的民族，惟有中国的文字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仅此一点，在世界上所有的著名的民族之中，就是一个非常珍稀的特征。正是因此，才会有世界上汉人最多、性情最文静、聚居最和平、国家最统一的长期的历史记录。

近三百年来，西方向世界输出战争，到处殖民，到处扩张，非洲、亚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到处被西方人的战火烧得无法安宁。不幸而又幸运的是西方人的自相残杀（两次世界大战），空前的大死亡才促使他们暂时平静下来。这就是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模型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的礼物。虽然不可否认，近代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和新技术的确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生活便利和创造幸福的物质条件，然而人本身绝不仅仅是物质。应该说，人的本质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精神。人类所永恒追求的真、善、美，更侧重的还是在其伟大的精神。

要清楚地分析现代西方文化愈来愈绝情的沙漠文化特征，就必须深入回顾他们的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文化逐渐走向崩溃衰落的传统。这个传统即是特别讲求功利的彻底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伦理传统。过去在希腊—罗马时代，这种伦理传统多少还受到传统的多神宗教的神秘性的牵制，人们的理性多多少少还不得不在神秘的非理性面前打上许多折扣。现代西方人不同，科学的理性和理性主义如同永不熄灭的阳光，把一切神秘的情感都驱赶得无影无踪。传说的基督教上帝只不过是一个习惯性的符号，人们在作出任何行为选择之前与这位根本不存在的上帝毫无关系。

宗教的力量在西方人传统的意义上从来就是道德的力量。宗

简言之，传统的中国人具有深厚的人情味。中国人没有狂热的宗教情绪、种族情绪、阶级情绪，中国的汉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混杂的同文的民族，惟有中国的文字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要清楚地分析现代西方文化愈来愈绝情的沙漠文化特征，就必须深入回顾他们的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文化逐渐走向崩溃衰落的传统。

宗教的力量在西方人传统的意义上从来就是道德的力量。宗教影响的丧失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基础的完全丧失。



那种缺乏文化意义的爱的社会除了最终变成最绝情的文化沙漠之外，它们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呢？

教影响的丧失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基础的完全丧失。结果，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便完完全全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快乐主义等等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加上西方人在文化传统中本就不重视家庭内部的孝悌精神，结果在家庭中只具有自然意义的父爱、母爱、性爱，却根本不存在儿女们必须爱父母的完全属于文化意义的恩爱。文化意义之爱的淡薄促使在西方人的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之一家庭中就缺少了文化。一个在家庭中都没有文化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社会中创造出文化来呢？人们连家庭都不爱他怎么可能去爱他的社区、爱他的同胞、爱他的民族、爱他的祖国呢？更又凭什么，他会更一般地如基督教教义的教诲，去爱全人类呢？西方人只把他们的民主、自由、科学技术当作是他们文化的主体，的确，这是社会意义上不可缺少的文化，但如果没有文化意义的爱（注意，人们的爱子女、爱异性只是自然意义的爱），也即人类后天意义之中的爱父母、爱兄弟、爱姐妹、爱朋友、爱同胞、爱民族、爱祖国、爱人类，西方人将凭什么而去有机地、自组织地建构他们的文化的社会呢？那种缺乏文化意义的爱的社会除了最终变成最绝情的文化沙漠之外，它们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呢？

在非常近似的意义上，现代西方文化的兴盛和衰落的必然性可以从希腊—罗马社会的兴盛和衰落的历史中观察到。

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希腊模型与希伯来模型的合二为一的时期与西方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代希伯来模型再次与希腊模型联姻的时期相应，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都是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空前的进步。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实质是希腊哲学精神与希伯来宗教精神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联姻——引者）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①数学家欧几里德，天文学家希帕恰斯、托勒玫、阿利斯塔克，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医学家加伦，力学家阿基米德，这

^①《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224页。



些希腊化时代的著名人物与近代西方的科学先驱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等相应。从精神方面说，他们都是希腊模型的哲学求知精神与希伯来模型的唯一神宗教信仰精神联姻的产物。中国近代历史上缺乏这两种精神的任何一种，所以近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无论如何不可能首先出现在中国。这是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基础既需要某种绝对的客观性精神的支持，又需要某种相对主观的必然性精神的支持，前者饱含在希伯来信仰的意志之中，后者富含于希腊的哲学的理智之中，然而中国人的思想传统之中既缺乏绝对的客观性，又缺乏相对主观的必然性。中国人在信仰和求知的精神方面始终被天人合一论和整体循环论的联合混沌模式（阴阳五行说）支配着，如果不是近代科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人自己将永远创造不出这种新型的科学，这不是彻底把中国人看扁了，实在是中国人在精神的基因中缺乏那两种原型。中国人的信仰精神基本上是汉儒经学中的天人合一的缜密的神秘主义，中国人的求知精神则主要是宋儒的“兴天理，灭人欲”的那套结不出科学之果的理学。这两者一个是伪宗教信仰，一个是伪形而上学（哲学），它们根本不是人类应有的原精神。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只要中国人一旦拥有了所有的原精神，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将绝对是无可限量的。

希腊化时代第一次的科学兴旺发达的势头，被罗马帝国后期兴起的基督教的神权专制遏制了，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前的约整整一千年的西方中世纪时代，文明的希腊模型沉寂了，文明的希伯来模型居于独霸的地位。近代西方的伟大的科学先驱哥白尼、伽利略等不得不冒着生命的风险表达自己的希腊式的理智，布鲁诺则不幸被烧死在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接着的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又从不同的角度动摇了单一希伯来文明模型的地位。16世纪开始的哲学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为希腊文明模型的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宝座扫清了道路。政治革命（1688）和社会革命（1789）则隆重地把文明的希腊模型迎上了宝座。伴随发生的一系列的工业